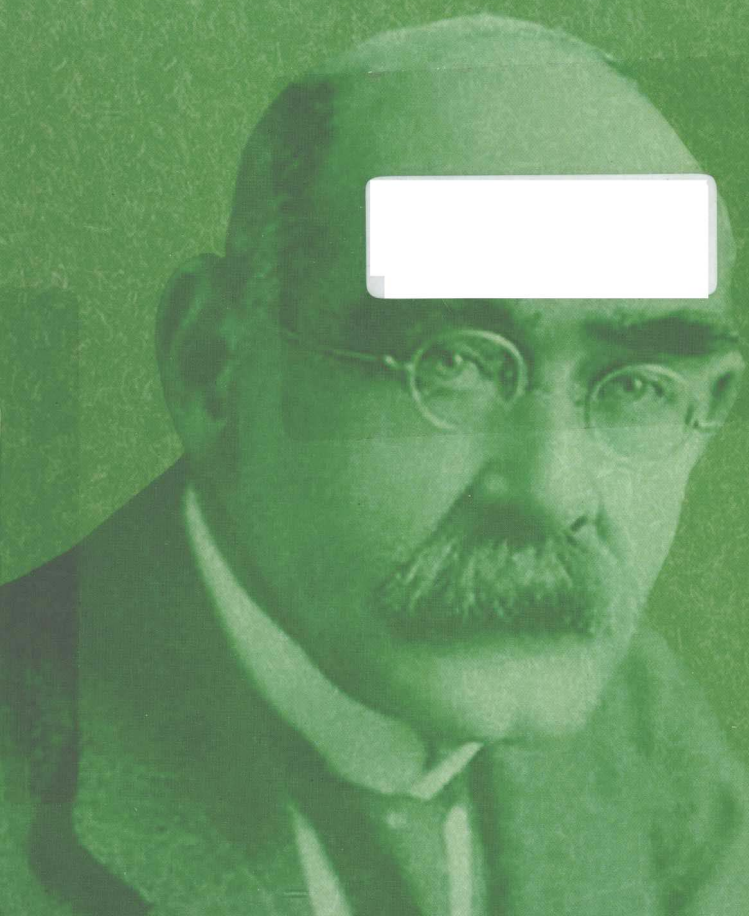




鲁德亚德·吉卜林研究

A Study of Rudyard Kipling

陈 兵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鲁德亚德·吉卜林研究

陈 兵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德亚德·吉卜林研究/陈兵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6
(文学论丛)

ISBN 978-7-301-22136-5

I. ①鲁… II. ①陈… III. ①吉卜林, J. R. (1865—1936)—文学研究
IV. ①I561.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6381 号

书 名: 鲁德亚德·吉卜林研究

著作责任者: 陈 兵 著

责任编辑: 张 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136-5/I·259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邮箱: zbing@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149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4.75 印张 258 千字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前 言

提到英国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1865—1936),我们一般会想到他是英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个“帝国主义”作家。吉卜林有没有帝国主义思想?当然有,其遐迩闻名的《基姆》(*Kim*, 1901)和《丛林之书》(*Jungle Books*, 1894, 1895)等小说(集)和《东方和西方的歌谣》(“The Ballad of the East and West,” 1889)、《退场赞美诗》(“The Recessional,” 1897)、《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 1898)等诗歌都浸透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意识。但将吉卜林贴上“帝国主义作家”的标签其实无助于我们对他的理解,因为他的创作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他的创作时间近50年,一生共创作了8部诗集、4部长篇小说、21部短篇小说集和历史故事集,以及大量散文、游记、回忆录等,其作品涵盖殖民文学、教育小说、儿童文学、历史小说、科幻小说等诸多领域,涉及东西方关系、身份认同、新女性问题、青少年教育、心理治疗等多种主题。其很多作品都在国际上受到欢迎并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不可能用一个“帝国主义作家”的标签就可以将其准确定位。

吉卜林杰出的叙述才能、突出的想象力、在艺术内容和形式上的创造性革新使得他成为当时英国文学中的重要作家。19世纪80年代末,不满24岁的吉卜林从印度回到英国时,英国文学在经历了维多利亚时代盛期的辉煌之后开始有点青黄不接。当时的文学巨匠们大都已经辞世或者江郎才尽。英国公众正在翘首企盼,希望有人来接替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等人留下的空缺。吉卜林以其充满活力和强劲节奏的歌谣以及奇妙有趣、充满异域风情和叙述魅力的故事迅速征服了普通英国公众。不到几个月的工夫,吉卜林已经声名鹊起,当时的主要批评家们都把他当做狄更斯的接班人。但与此同时,吉卜林也因为其小说和诗歌中表现的帝国主义思想和粗野倾向而饱受诟病。他成为“英国帝国主义的先知”。(Rutherford 1964: 72)其诗歌被批评“流氓的声音”。这种争议一直在持续。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大英帝国的统治。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危害,开始猛烈抨击帝国主义。吉卜林的声誉开始下降。远在吉卜林1936年去世之前,一家美国的报纸已经开始宣称,“对于大多数英国人来说,吉卜林已经变成非常遥远的记忆了,他好像已经变成过去时代的民间传奇的组成部分或是早已经作古了的经典作家”。(空草 2002:148)

尽管吉卜林的不少好作品还很畅销,但他逐渐淡出了英美批评界的视野。1941年当时名满天下的现代主义诗人和评论家T. S. 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编选了吉卜林的诗集,并为之撰写长篇序文,为吉卜林正名。此后英美批评界才慢慢开始重新关注吉卜林的作品。^①随着近几十年后殖民主义文艺批评理论的兴起,吉卜林重新成为批评界关注的中心。新的吉卜林传记不断问世,批评著作和文章也日益增多。直到21世纪,还不断出现吉卜林的传记和评论专著。

吉卜林在中国的接受也经历了坎坷的历程。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社会动荡,民众整体教育水准低下,外国文学的研究缺乏深厚的土壤和安宁的环境,吉卜林也没有得到中国学界应有的重视。1950年以后中国社会学习前苏联,“左倾”思想严重。吉卜林被称为“反动的帝国主义作家”,中国学者避之唯恐不及,当然更不可能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1980年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封闭多年的中国民众亟欲了解外面的世界。外国文学成为他们了解世界的窗口。吉卜林的不少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中国的文学批评界也开始逐步关注吉卜林的作品。学者们开始运用多种方法,从多个视角来探讨吉卜林的作品。但是中国的吉卜林研究现状还远不能令人满意。目前国内对他的研究只有两部不全面的专著和几十篇论文。这个号称英国文学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作家至今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还有一些神秘,他的很多优秀作品在中国还没有得到介绍和研究。特别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他的关注大都停留在吉卜林创作于1900年以前的作品上,对其创作于20世纪的后期小说及其许多优秀诗歌都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而没有对吉卜林及其作品的整体把握,我们就不能很好地了解吉卜林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也很难对其在英国文学史上的贡献作出客观全面的评价。

本研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以国内外现有的吉卜林研究为基础,致力于对吉卜林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探讨。众所周知,吉卜林创作时间长,作品数量众多,而且其不同时期的作品所关注的问题以及创作风格和主题都有所差别,相当复杂而难以把握,目前国内尚没有全面论述吉卜林的著作,当与此有关。本研究拟根据其创作时间,依次对吉卜林各个时期的主要作品进行详细的解读,包括其创作的全部长篇小说(四部)、绝大多数短篇小说集和主要的诗歌等。这其中不仅有《基姆》、《丛林之书》、《普克山的帕克》(*Puck*

^①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随着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化,批评界对吉卜林的态度不断变化,但读者大众一直喜欢吉卜林的作品。他的小说和诗歌一直畅销不衰。美国著名侦探小说作家劳伦斯·布洛克(Lawrence Sanders, 1938—)出版于1979年的“雅贼”系列小说之一《喜欢引用吉卜林的贼》(*The Burglar Who Liked to Quote Kipling*)就利用了读者对吉卜林的喜爱在书中嵌入了与吉卜林作品相关的情节。这部小说出版当年就获得了美国首届“尼禄”侦探悬疑文学奖。

of Pook's Hill, 1906)等小说(集)和《退场赞美诗》、《东方和西方的歌谣》、《白人的负担》等诗歌,也有其不太受人关注的作品,如其前期的长篇小说《消失的光芒》(*The Light That Failed*, 1891)、《瑙拉卡》(*The Naulahka*, 1892)以及其后期创作的短篇小说、诗歌等,希望以此来向读者呈现一幅完整清晰的吉卜林创作的整体面貌图景。在吉卜林创作的具体分期问题上,鉴于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承认吉卜林的生活经历对其创作的巨大影响,本研究也主要以吉卜林的生活经历作为其创作分期的依据,本研究将吉卜林的创作粗略分为五个阶段:吉卜林中学毕业后去印度工作期间(1882—1889)以及他从印度回到英国的最初几年定为其创作的初期;而其结婚后在妻子娘家、美国佛蒙特州布拉特布罗镇居留期间(1892—1896)为其创作的第二阶段;吉卜林一家从美国回到英国,在各地辗转直到1902年在英国苏赛克斯郡乡下定居这段时间标志着吉卜林世纪之交的创作;此后到1910年或1911年其父母离世(也可以延伸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是吉卜林20世纪初的创作时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其生命的结束为吉卜林创作的后期。本研究的这种分期主要是为了方便讨论吉卜林的创作,妥当与否自然可以商榷。不过,尽管吉卜林创作中关注的很多问题在其所有时期的作品中都有体现,但相对而言,其不同时期的作品在关注的问题上和艺术风格上还是各有其不同的特征,因此通过这样的分期讨论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解读其人其作。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时间有限、资料搜集困难等原因,本研究主要以吉卜林的小说为研究对象,但会辟专章对其各个时期的主要诗歌进行系统的讨论。

在研究吉卜林时我们会将其置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来进行综合考察。众所周知,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都不是孤立现象,而是与其生活的社会和时代紧密相连。作家的个人经历、时代的社会思潮和文学倾向都会影响其世界观和创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世纪法国学者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 1828—1893)在其所著《英国文学史》(*Th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1864)中提出的“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论尽管有偏颇之处,还是很有道理的。丹纳的《英国文学史》写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其时英国的工业化已经完成,社会财富剧增,国家飞速发展。国家的强盛使得英国人产生了普遍的自豪感和民族优越感,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思想广泛流行。可以说,丹纳的三要素论本身就是那个时代各种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吉卜林出生于该书出版的第二年,成长在这样的环境里,他自然也感染了时代的风气。将其作品放到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我们就会发现,吉卜林的帝国主义思想并不是个案,而是那个时代英国——甚至可以说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普遍倾向。与吉卜林同时代的作家多多少少都持有

类似的思想观念。譬如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拉伊德·哈格德(Rider Haggard, 1856—1925)等。因此,将吉卜林的作品放到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社会语境里进行研究,特别是将吉卜林的作品与同时代其他英国作家的作品进行平行比较,一方面可以加深我们对那个时代英国文学的整体了解,也进一步了解产生这种文学的社会历史文化。所有这些对于今天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来说都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另一方面,在研究中我们也会重视吉卜林个人的独特生活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一个作家的个性往往形成其作品的独特之处,而这一般源于其与众不同的生活经历及其因此而形成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有评论者批评丹纳的文学观过于强调外部因素而忽视了作家的个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也不无道理。了解吉卜林的生活经历会帮助我们解读吉卜林及其作品的独特之处。譬如,美国著名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 1895—1972)等人曾经提出,吉卜林不愉快的少时经历对其后来的创作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个观点在批评界已经被广泛接受,对于我们今天全面探讨吉卜林及其作品仍然有启发作用。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以社会历史方法和文化研究为主,力图通过对吉卜林小说和诗歌作品的文本细读,讨论其作品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以及产生、造就吉卜林的文化气候,以期在深层次上认识和了解他,从而进一步认识和了解吉卜林生活其中的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前期的英国社会。不过,对于吉卜林这样涉猎广泛的多产作家,任何一种单一的研究方法都不可能完全揭示其作品的内涵,因此,其他研究方法,如精神分析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等,都在本研究中得到运用,因为它们都能从不同的侧面帮助我们解读吉卜林的作品。我们认为,吉卜林作品的丰富和复杂正需要一种综合的方法才能揭示其奥秘。

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几个术语的使用问题。本研究中多处使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东方主义”等术语。“帝国主义”一般指“通过殖民手段、武力征服以及其他方法扩大一个国家的权力和影响的政策”,“殖民主义”则指“获得对别的国家进行完全或部分政治控制,对其进行殖民并进行经济剥削的政策或实践”。(Pearsall et al 2007: 1052, 415)而“东方主义”根据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创始人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的定义则是“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

(爱德华·W·萨义德 2000:4)^①这几个术语在本研究中的含义有交叉之处,特别是在意识形态表达的层面上。有的学者就将“殖民主义”表述为“早期的、没有体制化的帝国主义。”(汤林森 1999:11)有鉴于此,为方便讨论,本研究对这几个术语的使用不作严格区分。

本研究除前言和结束语外,共分为9章。第一章介绍吉卜林的生平与创作以及他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重点是那个时代的帝国主义思想及其对吉卜林的影响,同时也梳理吉卜林的独特世界观;第二章主要讨论中外吉卜林研究的发展,梳理吉卜林在英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变迁,并通过这种变迁使读者得以管窥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英国文学潮流的变化情况;第三章至第七章对吉卜林不同时期的小说进行研究,涵盖吉卜林全部4部长篇小说和绝大多数短篇小说集,尽量向读者呈现吉卜林小说创作的全貌;第八章主要讨论吉卜林的诗歌创作。到目前为止,国内学者对吉卜林的诗歌创作研究还很少,本章旨在厘清吉卜林诗歌创作的艺术渊源,并对其各个时期的重要诗作进行系统的研究,从而为以后对其诗歌的进一步探讨打下点基础;第九章总论吉卜林对英国文学的贡献。我们希望通过本研究向国内读者全面介绍吉卜林这位英国重要作家的创作情况,同时从侧面表现吉卜林所处时代英国的社会文化潮流的变化,增进他们对吉卜林以及英国文学的整体了解。

① 萨义德著作英文名为 *Orientalism*。此词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种学术研究学科;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力话语。翻译时若注重该词的学科含义可以将其译为“东方学”,若注重思维方式或权力话语则可译为“东方主义”。也可以不加区分,将此词通译为“东方学”或“东方主义”。本研究所引用的中文译本采用“东方学”译名以总括这三种含义。参见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3页。

目 录

前 言	i
第一章 鲁德亚德·吉卜林的生平与创作	1
第一节 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英国	1
第二节 吉卜林的生平与创作	8
第三节 吉卜林的帝国主义思想	19
1.3.1 吉卜林的生活哲学	19
1.3.2 吉卜林的理想化帝国主义思想	23
第二章 中外吉卜林研究状况	28
第一节 西方的吉卜林研究	29
2.1.1 吉卜林的迅速崛起	29
2.1.2 英美批评界对吉卜林的批评	33
2.1.3 吉卜林名望的回归	38
第二节 中国的吉卜林研究	45
2.2.1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吉卜林研究	45
2.2.2 1950年至1970年中国的吉卜林研究	48
2.2.3 1980年以后的吉卜林研究	49
第三章 吉卜林的早期小说创作	54
第一节 吉卜林的早期短篇小说中殖民主义的矛盾	54
3.1.1 英印小说:殖民主义者的傲慢和困境	55
3.1.2 驻印英军故事:帝国军人的英武和残暴	60
3.1.3 印度人故事:类型化的东方人及高尚的东方人	62
第二节 《消失的光芒》中的两性冲突	66
3.2.1 吉卜林自身经历的感悟	68
3.2.2 新女性的威胁	70
3.2.3 男子汉的坚持	75
第三节 《瑙拉卡》中的新女性与东方主义	78
3.3.1 “挽救东方”的新女性	80

3.3.2 殖民主义的傲慢与焦虑	83
第四章 吉卜林居留美国期间的小说创作	89
第一节 帝国与家:《丛林之书》与其他短篇小说	89
4.1.1 丛林法则与帝国少年的成长	91
4.1.2 家的追寻与吉卜林的认同危机	96
4.1.3 东方与西方的连接	100
第二节 《勇敢的船长们》:实践工作的教育	104
4.2.1 体育运动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青少年教育	105
4.2.2 《勇敢的船长们》中哈维的教育	107
4.2.3 吉卜林的工作理念及其渊源	111
第五章 吉卜林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的小说创作	115
第一节 《斯托凯与其同党》:公学小说的异端	115
5.1.1 英国公学改革与公学小说	117
5.1.2 《斯托凯与其同党》对英国传统公学小说基本理念的颠覆	119
5.1.3 《斯托凯与其同党》对英国传统公学小说基本理念的认同	122
第二节 《基姆》:东西方的融合	126
5.2.1 英印对立与英印一体	127
5.2.2 东西方的融合	131
5.2.3 对殖民主义的超越:吉卜林对《基姆》的修改	135
第三节 《本来如此的故事》:童真与东方主义	137
5.3.1 纯真的儿童故事:童趣、温情与教育	138
5.3.2 吉卜林的传统女性观和东方主义思想	142
第六章 吉卜林 20 世纪早期的小说创作	146
第一节 吉卜林对大英帝国现状的忧虑	149
第二节 吉卜林对大英帝国未来的期望	154
第七章 吉卜林后期小说研究	160
第一节 大战的记忆:创伤、报复与宽容	162
第二节 暮年的阴影:疾病、爱和宽恕	166
第三节 共济会:心灵的家园	170

第八章 吉卜林的诗歌创作	175
第一节 吉卜林的诗歌创作及其渊源	175
第二节 吉卜林主要诗歌的主题与风格	178
8.2.1 《机关谣曲》及其他早期诗歌	178
8.2.2 《军营歌谣集》与《七海诗集》	181
8.2.3 《五国诗集》	187
8.2.4 《中间年代》及其他诗歌	190
第九章 吉卜林对英国文学的贡献	194
第一节 吉卜林对英国文学题材的拓展	195
第二节 吉卜林对英国短篇小说和诗歌的贡献	198
第三节 吉卜林对后世作家的影响	202
结束语	206
参考文献	209
附 录	216
后 记	219

第一章 鲁德亚德·吉卜林的生平与创作

第一节 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英国

维多利亚时代无疑是英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始于18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迅速而无序的发展也带来了诸如贫富分化、社会矛盾突出等问题,特别是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所以当时有“残酷的30年代和饥饿的40年代”的说法。但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的社会矛盾开始缓和,人们开始享受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成果。作为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迅速在世界各地抢占了大片市场。其庞大的船队从其遍布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带回糖、茶叶等生活必需品以及棉花和其他原材料,又将棉纺织品及其他各种工业产品源源不断输往世界各地,为英国换来无数的财富。英国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这些迅速积累起来的财富又成为英国在世界各个地方进行投资的原始资本。到了19世纪70年代,英国首都伦敦又成为“世界银行”,国际金融中心。同时,殖民地的发展也为英国带来了大量财富。到了19世纪90年代,英国的殖民地已经占据了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英国在19世纪末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

在英国成为世界强国的过程中,殖民扩张功不可没。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扩大了欧洲人的视野,而传说中东方丰富的黄金、香料等奢侈品又激发了欧洲人扩张和冒险的欲望。得地理之便,而本身又资源匮乏的葡萄牙、西班牙便成了第一波探险和征服热潮的急先锋。他们航行到非洲、亚洲和美洲等地,夺取了大量的土地,也建立了利益丰厚的贸易地区。英国人在这一波殖民扩张中落后于西班牙等老牌殖民主义强国,但也于1584年在北美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殖民地,^①并于1600年组建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负责殖

^① 1578年伊丽莎白女王授命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Sir Humphrey Gilbert, 1539—1583)进行海外探险。汉弗莱即于当年航行前往西印度群岛,拟在当地建立英国殖民地,但船队没有越过大西洋即终止了航行计划。1583年汉弗莱第二次航行至纽芬兰岛,宣布英国占有该港口,但没有留下人员驻留。1584年,汉弗莱的同母弟瓦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 1552—1618)再次前往北美,并在今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沿岸建立了罗阿诺克殖民地。但由于给养不足,这个殖民地后来无果而终。

民地事务和海外贸易。随着1607年英国在北美的第一个永久性殖民地詹姆斯敦的建立,英国拉开了在北美等地殖民扩张活动的大幕。而自1688年“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后,英国逐渐从以前的内部政治纷争中解脱出来,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政治制度比较稳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迅速,开始具备了向外扩张的条件。应该说,近代西方殖民主义活动是同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机联系在一起的,英国也不例外。当时英国朝野上下都信奉重商主义,对外贸易在英国的国民经济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追求并扩大广阔的海外市场就成为当时英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于是在“光荣革命”后,英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扩张,与荷兰、法国等国兵戎相见。特别是进入18世纪后,随着西班牙、荷兰等老牌殖民帝国的衰落,英法之间为争夺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在欧洲大陆、北美和印度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经过这些战争,特别是英法“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 1756—1763)后,英国获得了大片殖民地,法国在北美的势力基本上被肃清,英国在北美的殖民统治地位则基本确立。而在欧洲、印度、加勒比海、西非等地,英国也获得了不同的殖民利益,初步形成了一个世界范围的大英帝国雏形。这个18世纪以前的殖民体系在英国历史上有时被称为“第一帝国”(The First Empire)。“第一帝国”在北美殖民地独立以后瓦解。英国在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Napoleonic Wars, 1799—1815)之后建立起来的殖民帝国往往被称为“第二帝国”。“第二帝国”主要形成于维多利亚时期,并于19世纪末达到鼎盛状态。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对殖民地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直到18世纪末期,英国仍然奉行重商主义政策,英国人把殖民地看做是本国市场的延伸,要求对殖民地的生产和销售进行垄断,将其作为母国产品的推销地和原料供应地。为此,英国政府颁布《航海条例》(The Navigation Acts, 1651),规定殖民地只能与母国进行贸易,禁止它们与其他国家自由通商。但到了19世纪初期,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提出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受到政治经济学家们的追捧。他们提倡自由贸易和竞争,反对在殖民地实行商业垄断。在他们看来,商业垄断既阻碍生产发展,又不能增加商业利润。只有解除一切贸易限制,创造一种自由竞争的环境,才能让经济获得最大的发展。在殖民地问题上,这些人也非常赞同斯密的观点,认为保留殖民地属于多余——既然贸易开放了,殖民地就只会给母国带来负担,如行政管理经费和防务开支等。他们认为英国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海上霸权,完全能够控制全世界的贸易,没有必要保留一个正式的帝国,相反,保护英国的海上通道更能确保英国的利益。而对于已有的殖民地,他们认为英国应对其承担责任,鼓励其成长并逐渐成熟,直到最后脱离母国独立,就

像子女长大成人以后离开父母一样。这就是英国在 19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出现的“自由帝国主义”思潮。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世界上只有英国是工业国家,实力最强,不惧怕任何竞争。所以所谓的“自由竞争”不会对它构成任何威胁,反而会给它带来更大的经济运行的空间,带来更多利益。此外,“自由帝国主义”思潮并没有实质性地影响 19 世纪上半叶英国的扩张政策。大英帝国在此期间并没有试图摆脱其殖民地,而是继续获取新的殖民地,只是扩张的步伐稍微放缓了一些。实际上,在 1815 年—1865 年间,大英帝国仍以每年 10 万平方英里的速度在扩张。在 1841 年—1851 年间,大英帝国占领或兼并了新西兰、黄金海岸、香港、拉布安、纳塔尔、旁遮普和信德等地。(Eldridge 1984: 29)这个时期英国政治的代表人物、著名政治家帕默斯顿(Lord Palmerston, 1784—1865)就极具侵略精神。作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外交政策的设计师,帕默斯顿在担任英国外交大臣和两次担任首相期间(1855—1858; 1859—1865)制定了一系列均势外交政策,有效地保护了英国现有的海外殖民地,阻止了沙皇俄国的扩张,同时还以“自由主义”的名义推行扩张政策。在他当政时,19 世纪 30 年代英国帮助比利时脱离荷兰;19 世纪 40 年代英国用炮舰逼迫中国开放自己的口岸,同时强租中国的香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又击败了俄国。不少学者认为,帕默斯顿之后的英国首相,如保守党领袖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和自由党领袖格拉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 1809—1898)等人,尽管在其他方面的政治见解可能会大相径庭,但在海外政策方面都称得上是帕默斯顿的门徒,奉行其扩张政策。(计秋枫、冯梁 2002: 169)

另一方面,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从来都没有影响英国的印度政策。自从 1784 年英国议会颁布《印度法》,将对印度的统治权从东印度公司手里收归政府,实行英国政府委派总督制度以来,印度这个物产丰富的次大陆一直是英国的摇钱树。即便是在“自由帝国主义”思潮盛行的时候,也从来没有人说过英国应该放弃印度。1848 年达尔胡西侯爵(Marquess Dalhousie, 1812—1860)出任印度总督后,还加强了英国对印度的控制。不少学者认为,印度一直是英国最重要的殖民地,“英国女王王冠上最大的明珠”,整个英国 19 世纪的外交和军事政策都是围绕着保护印度而展开的。特别是英国和沙皇俄国之间的争霸,大都围绕着印度进行。比如 1854—1856 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实际上英国的目的就是阻止俄国向南扩张。而英国和俄国在阿富汗、伊朗的长期争夺,更是为了阻止俄国南下,保护印度的北方边境。1876 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 1819—1901)正式加冕为“印度女皇”,标志着英国对印度全面统治的开始。

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随着德国、美国和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迎头赶

上,英国逐渐失去其在世界上的工业垄断地位。英国的全球利益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德国、法国、俄国等都在大肆扩张,老牌殖民主义强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也在竭力保护自己已有的地盘。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殖民政策。一向主张殖民扩张的保守党人开始得势。保守党人本杰明·迪斯累利两度担任首相期间,英国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张和殖民争夺。1875年,英国取得了埃及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1878年英国又成功地阻止了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张。与此同时,英国还扩大了在中国和中东的影响,与欧洲列强在非洲展开了一系列的殖民角逐,并逐渐将埃及、苏丹、尼日利亚、英属东非、英属索马里等地并入英国的版图,并在南部非洲获取了巨大的殖民地。迪斯累利实行的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大英帝国的形成。

迪斯累利的殖民扩张政策受到了当时英国各个阶层的普遍拥戴,体现出当时英国日趋浓厚的帝国主义情绪。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开始支持英国实行帝国主义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抢夺殖民地。这方面的理论代表是查尔斯·迪尔克(Charles Dilke, 1843—1911)。他在《更大的不列颠》(*Greater Britain: A Record of Travel in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during 1866 and 1867, 1868*)中提出以种族为纽带,建立并维护一个“更大的不列颠”。在实践方面,尽管1880年由于英国国内政局的变化,迪斯累利下台,自由党人格拉斯顿组织政府。但格拉斯顿外交上的温和政策让许多英国人感到不满。很快,继迪斯累利之后担任保守党领袖的索尔兹伯里侯爵(Marquiss Salisbury, 1830—1903)上台执政。在他三度出任英国首相(1885—1886, 1886—1892, 1895—1902),英国继续执行迪斯累利的帝国扩张政策。甚至自由党方面也有帝国主义的有力支持者。其代表人物是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 1836—1914)。他反对爱尔兰自治,在贸易上也反对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提出建立保护性关税的理论。后来张伯伦还带领自由党联合派弃党,转而支持保守党的殖民扩张政策。张伯伦本人还在索尔兹伯里政府中担任殖民大臣,并努力建立“帝国联邦”,即将大英帝国中各白人殖民地联合成一个政治实体,设置统一的法律、议会,实行统一的贸易和外交政策,并以英国为联邦之首。这种帝国统一的思想首先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的思想界,以约翰·西利(John Robert Seeley, 1834—1895)的《英格兰的扩张》(*Expansion of England*, 1883)和詹姆斯·弗劳德(James Anthony Froude, 1818—1894)的《大洋国》(*Oceana, or, England and Her Colonies*, 1886)为代表。1884年英国还成立了一个“帝国联邦协会”,参与者不乏政府高官和殖民地官员。在这个协会的努力下,英国政府还召开了几次殖民地会议以商讨并推动帝国联邦的建立。但此时大英帝国内部已经出现离心倾向,各个殖民地已经逐渐成熟,开始出现一种“民族”的情感。因此两次殖民

地会议都无疾而终。而张伯伦提出的关税改革思想也没有实现。

思想的分歧导致保守党的分裂,并进而导致保守党政府下台。这些情况都标志着在19世纪末大英帝国已开始走下坡路。但帝国的扩张仍在继续。到了1897年,即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0周年时,英国实际统治的区域已比她刚登基时扩大了四倍,占有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此时的英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殖民扩张事件是1899年至1902年的布尔战争(The Boer War)。英国为了进一步加强在南部非洲的殖民统治,发动了对荷兰人后裔建立的德兰士瓦和奥伦治自由邦的布尔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3年,最终英国人打赢了战争,标志着英国的殖民扩张达到了巅峰。

伴随着英国的殖民扩张活动,英国民众的帝国主义思想也逐渐发展起来,并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达到了高峰。18世纪之前只有少数英国文人,如德莱顿(John Dryden, 1631—1700)等简单描绘过帝国图景,但到了18世纪中期英国的帝国观念已经比较清晰。1757年约翰·戴尔(John Dyer, 1699—1757)在其歌颂羊毛贸易的史诗《羊毛》(*The Fleece*)中已经提出“英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Pax Britannica)概念。而18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伯克(Edmund Burke, 1729—1797)则提出英国国会应具有有一种“帝国品性”,以其无所不在的权力“强迫疏忽者,控制狂暴者,帮助穷乏者”。(Dobrée 1967: 78—79)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各种思想迅速发展并激烈交锋,而关于帝国的思想也逐渐成熟。在这个时代初期,由于劳资矛盾的突出,英国掀起了规模巨大的宪章运动。为了缓解这种矛盾,曼彻斯特政治经济学派秉承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 1806—1875)的实用主义政治经济理论,提倡自由贸易,并主张无论对于政府还是个人,“为多数人谋取最大利益”都应是道德的基础和甄别是非的标准。该学派还认为自私自利是人类行为的原动力,提倡一种“理性自我主义”。这种理论实际上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初期资本家对下层人民的剥削进行了辩护,同时也为后来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肆扩张和对弱小民族的殖民压迫提供了理论准备。

19世纪中期开始,科学的迅速发展,地理学、天文学的新发现对传统哲学和宗教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在《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1859)和《人类的诞生》(*The Descent of Man*, 1871)里提出的生物进化论质疑基督教的神灵创世论,影响尤其明显。保守的教会人士和思想家们激烈反对进化理论,而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也在社会上蔓延,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强盛外表下的矛盾和焦虑。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哲人开始建立新的学说来代替受到动摇的基督教

信仰。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就是其中一位。作为一位保守的思想家,他并不相信民主。出于对社会混乱的担心,他开始将希望寄托在社会精英阶层中的杰出人物——也就是他所说的“英雄”——身上,认为他们能够给社会带来安宁和秩序。他在《英雄与英雄崇拜》(*Heroes and Hero Worship*, 1841)中声称,英雄创造历史,世界的历史说到底就是英雄的历史。(卡莱尔 1995: 1)无独有偶,同时期的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也表现了类似的思想。他的“超人”理论也将挽救世界的希望寄托在意志、品德都十分坚强的“超人”身上。卡莱尔的英雄理论和尼采的“超人”理论对当时的英美普通大众有相当大的影响。譬如,与吉卜林同时期的著名戏剧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就接受了他们的理论,认为人类的进步依赖于一代代天才的发展。这些天才才是社会进步的先锋,而他们又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同时代人的嫉恨。另一方面,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又被应用到社会领域。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等人将其演化成社会达尔文主义,鼓吹社会领域的“优胜劣汰”法则。斯宾塞的理论当时在英美都很有影响。据统计,到1903年他去世时,其著作仅在美国就已卖出近40万册。(索普 1984: 159—160)

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发展成一个大帝国,在普通民众中引起了广泛的乐观自豪心理,使他们对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优越性和统治能力深信不疑。英雄崇拜、“超人”理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理论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晚期的风行多多少少迎合了这种心理,同时又使他们认可富人对穷人的剥削以及英国对弱小民族的殖民掠夺。譬如,英国政治家张伯伦曾在演讲中这样宣扬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优越性:“我相信这个种族,最伟大的统治种族,如此高傲,如此顽强,自信而又坚决,风雨不会侵蚀她,时光不会改变她。她注定会成为未来历史和宇宙文明的杰出力量。”(Dobrée 1967: 80)这段文字很自信,也很煽情,表达的是当时英国民众普遍的自信。这种自信还表现在当时不少英国人将英国与古罗马帝国相提并论。如亨利·詹姆斯就将英国比作熙熙攘攘的古罗马世界,而伦敦就是野蛮人纷纷前来朝贡的古罗马城(Raskin 1971: 89),言语之中明显表露出对大英帝国的自豪感。

在宣扬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性和大英帝国统治能力的同时,英国人还将殖民地土著刻画成懒惰、无知和野蛮的民族。在许多英国人看来,英国的这些殖民地本是野蛮原始之地,没有任何文明可言。卡莱尔曾经这样描写英国殖民地西印度群岛:“欧洲白人三个世纪前第一次发现这些岛屿。在此之前的无数时代里这些岛屿出产更多的是丛林、毒蛇、痢疾和野蛮习俗,